國　史　館　館　刊
第六十二期（2019年12月），頁165-198
©　國　史　館

臺籍戰歿日本兵紀念場域的形塑：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

陳柏棕

摘　要

創建於1961年的濟化宮源自新竹縣北埔鄉客籍礦工之小眾信仰，據稱因神蹟顯著，使得信徒日增，又獲礦主詹清河支持，而擴大為頗具規模的廟宇。經詹清河運籌帷幄，再藉著舉行公益活動廣開知名度，同時取得和黨、政之間的連結，使得宮務蒸蒸日上。其後，廟方表示因神靈諭示，1979年起，濟化宮領導們透過靖國會牽線，遂向靖國神社展開交涉，至1982年10月，對外公布取得其提供之《祭神簿》，且將合祀於靖國神社之臺籍日本兵亡靈迎回宮內安奉。不過，濟化宮此舉卻招來社會輿論的質疑，指其宣稱經靖國神社授權分靈之說為造假，靖國神社方面亦出面否認授權一事，使得濟化宮飽受臺灣社會多方抨擊。直到1990年代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向臺籍日本兵及戰死者遺族進行補償後，濟化宮義務提供部分遺族對日求償資料，許多遺族因此受惠，藉此契機使社會觀感為之一轉，此後更成為遺族尋親探源、定期追悼親屬的重要之地。

關鍵詞：濟化宮、靖國神社、祭神簿、臺籍日本兵、遺族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Shaping a Memorial Space for the Deceased Taiwanese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A Case Study of Jihua Temple

Po-zong Chen*

Abstract

Located in Beipu, Hsinchu, Jihua Temple was founded in 1961 and initially served as a center for local beliefs among Hakka miners. It has continuously attracted believers due to its recurrent "miracles." Moreover, with the support of Zhan Ching-ho, a mine owner, Jihua Temple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local influence by engaging in charities and keeping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uling party. In the late 1970s, as a result of an oracle and an endeavor to gain profits for the newly constructed columbarium, leaders of Jihua Temple attempted to negotiate with Yasukuni Shrine in Japan for cooperation. In 1982 Jihua Temple announced that it had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e "List of Enshrined Deities" from Yasukuni Shrine and would re-enshrine the shared spirit of Taiwanese martyrs worshipped at the Shrine. However, Yasukuni denied that it had authorized the List. Consequently, Jihua Temple was accused of faking the authorization and widely criticized for misleading the public. The bad press Jihua Temple received in the society continued until the 1990s,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mally declared offering compensations to descendants of the deceased Taiwanese soldiers. Jihau Temple voluntarily provided the applicants with required documents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ked for. The temple thus turned around public opinion

* Staff of the Archives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ever since as a significant venue for comrade-in-arms and bereaved families in commemorating the war dead.

Keywords: Jihua Temple, Yasukuni Shrine, List of Enshrined Deities, Taiwanese soldiers, bereaved families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臺籍戰歿日本兵紀念場域的形塑：以新竹北埔濟化宮為例*

陳柏棕**

壹、前言

依據日本厚生省（今厚生勞働省）於1973年4月14日公布的資料，在二戰期間臺灣出身之軍人、軍屬共計207,183人，戰死者有30,304人，其中合祀於靖國神社者為27,864人。[1]隨著戰爭結束政權的遞嬗，臺灣人曾為日本軍人、軍屬的身分轉趨隱晦，戰歿者更在不符合國族框架下，被中華民國政府排除彰顯的資格，無法入祀忠烈祠，不能享有國家祀典之榮譽，而與日本人合祀在東京的靖國神社。

戰後，日本的二戰戰歿者遺族進行集結，1946年6月，各地遺族集聚召開戰爭犧牲者遺族同盟大會，其後陸續組織了全國平和聯盟、日本遺族厚生聯盟，至1953年3月，再進一步改組，成立財團法人日本遺族會。日本遺族會規模龐大，分會遍布全國，該會積極向政府遊說，推動援助戰爭中遇難者家屬的相關立法，

---

* 本文承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康豹（Paul R. Katz）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訂意見與參考資料，實受益匪淺，謹此致上最深謝意。
收稿日期：2019年5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1 臺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臺湾・補償・痛恨：臺湾人元日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東京：臺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1993年），頁87。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並與自由民主黨及政府部門保持長年密切關係，對日本政界頗具影響力。[2] 日本遺族會不僅為倖存者爭取維持物質層面利益，還重視當代的日本如何記住和尊重戰爭死難者、孤兒與失去親人者之問題，例如促成政府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要求官員參拜靖國神社等。1985年，總理中曾根康弘前往靖國神社正式訪問，便是該會為維持國家與靖國神社之間緊密的連繫，多年來努力的成果。日本遺族會更在1979年提案由國家出資，建造一座公共博物館或展覽空間，以紀念戰歿者和他們的親屬，終在1999年3月有「昭和館」的落成。[3]

在Jay Winter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研究中，主張紀念（remembrance）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4] 如同日本二戰遺族，一方面向國家爭取權益，一方面也不忘傳達必須紀念戰死親屬的聲音。反觀在臺灣，戰死者遺族因政治體制的限制，未能出現如日本遺族會這般強而有力的組織，使得無法團結民間力量，展開權益的爭取，長年來甚至連公開追悼（參拜）先人的祭祀場域亦付之闕如。面臨著不具接受國家表彰的資格，沒有可供集體匯聚的紀念之處，僅能在家族內部進行祭拜、追思。

依臺灣民間傳統喪禮，人死後由家屬「安靈」，供奉魂帛或靈位牌，令亡靈有暫時安所。經一段時日再行「除靈」，將所設之靈位撤除，把亡者姓名轉題於祖先牌位上，納入列祖列宗之中一同合祀，是為「合爐」，[5] 這代表著獨立的亡者靈位牌不復存在；再加上當這些戰死者的父母、手足或子女等直接關係者年老凋零，其個人及所擁有特殊（甚至付出生命）的時代經驗，也就有可能隨著時間

---

2 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實，《遺族と戦後》（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頁41、58、158-162、194-198。

3 關於昭和館的建立過程及其所引發的爭議，參見Kerry Smith, “The Shôwa Hall: Memorializing Japan’s War at Home,” *The Public Historian,* 24:4 (Fall 2002), pp. 35-64.

4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轉引自藍適齊，〈從比較的脈絡對臺灣人二戰史的反思：跨國性的臺灣人二戰主體〉，「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17年11月10-11日。

5 參考江慶林主編，臺灣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小組撰稿，《臺灣地區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3年），頁9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的流逝而逐漸被後人淡忘。1982年10月，新竹縣北埔鄉的濟化宮宣稱，將合祀於靖國神社的臺灣人亡靈迎靈回臺，安祀於宮內，遺族始有追悼親人的公開場合，而出現傳承記憶的契機。濟化宮至靖國神社迎靈，在當年引發各界正、反兩極的評價，日後更成為戰死者遺族在特定時間前往追悼與祭祀的重要場所。

有關濟化宮的議題，迄今學術研究成果甚少，僅見黃智慧、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藍適齊發表之論文有所討論。黃智慧是首位論述濟化宮的研究者，指出1979年濟化宮的巫覡表示有某位臺籍日本兵的靈魂，滯留日本成為無人祭祀的孤魂，為此，濟化宮首任理事長數次走訪靖國神社，終於將祂的靈魂從靖國神社迎回臺灣。廟方後來動用義工整理名單，將戰死者的姓名逐一寫在個人牌位上，於每年清明節（4月5日）及臺灣光復節（10月25日），接連舉行3天的慰靈祭，成為全臺唯一祭祀太平洋戰爭的戰歿者廟堂。[6] 黃智慧於該文以3段左右的篇幅略述濟化宮紀念場域的成立經過，仍稍嫌簡略，部分細節也與濟化宮的說法不盡相同，有待釐清。

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以靖國神社的《祭神簿》探討戰時臺灣人傷亡問題，引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的說法，表示臺灣現存的《祭神簿》是經靖國神社書面授權帶回，最終流落北埔濟化宮納骨塔，乏人聞問，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則透過管道取得了《祭神簿》。然經比對《臺灣導報》對於濟化宮的報導，鍾淑敏等指出該協會與濟化宮方面的說明出現不一致的問題，[7] 雖然如此，文中並未就此進行深入探討。

藍適齊探討在海外喪生的臺灣人及其遺族，文中敘述在新竹縣北埔鄉的濟化宮內，設有二次大戰時死難的3萬2千多名臺籍日本兵的靈位，也成為許多「臺灣

---

6 黃智慧，〈「戰後」臺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與課題：兼論其與日本關係〉，收入黃自進主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年），頁625-626。

7 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第10期（2015年10月），頁70；另參見〈北埔濟化宮臺籍日本兵英靈春祭〉，收錄於「臺灣導報」：http://www.taiwan-reports.com/?c=articles&a=show&id=55078（2019/6/21點閱）。

人二戰遺族」前往參拜的地方。其在註釋中補充：

> 根據報導，3萬2千多名臺籍日本兵的靈位，是於1982（民國71）年10月25日，由當時濟化宮董事長詹清河等，赴日本交涉，獲得同意，將3萬2千多名二戰時被日本徵調打仗，卻不幸戰死放在日本靖國神社的臺籍日本兵亡靈，迎回臺灣，安置在濟化宮的3樓，共有30排，每排11段，納骨塔的架子是用混凝土做成，4樓是總牌位，牌位中央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籍同胞軍英靈牌位」。[8]

仍引上述鍾淑敏等在論文所參考之《臺灣導報》報導內容，做概略性說明。總的來說，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觀之，缺乏對濟化宮、此迎靈行動及紀念空間的形成進行脈絡性討論。

本文使用由濟化宮常務委員陳韜編輯之廟志《濟化宮的回顧》、[9] 地方志《北埔鄉志》上、下冊、[10] 《中國時報》、《聯合報》等當代報刊、個人及團體所建置之網站，輔以實際前往濟化宮進行田野調查、訪談廟方人員等，以敘述濟化宮創建經緯，說明廟方管理階層透過哪些舉措，將濟化宮由偏鄉地帶的礦區小廟，引領為頗具名氣之地方廟宇。接續探討濟化宮至靖國神社迎靈的行動，討論此舉之始末，特別是廟方人員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何？祭祀場域與形制如何被建立？並論及社會觀感的變化，最後成為二戰遺族重要的紀念空間之經緯。

貳、濟化宮的創建及活動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小南坑，位於峨眉溪右岸支流大湖溪以南，因蘊藏豐富礦藏，在1946年至1970年間，吸引眾多外地人口前來採礦謀生。迨至1980年代

---

8 藍適齊，〈從比較的脈絡對臺灣人二戰史的反思：跨國性的臺灣人二戰主體〉，「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9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新竹：南天山濟化宮，1997年）。

10 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志》，上、下冊（新竹縣：新竹縣北埔鄉公所，2005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後，由於大量開採，礦源逐漸枯竭，再加上政府鼓勵礦工轉業，此地的採礦業才劃下句點。[11] 濟化宮即發源於這個採礦業興盛之地，最初起自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內出現的數則神蹟（神話）。

據稱在1961年6月間，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機電工張石華年方3歲之孫張桂芳，一日忽患急性腦膜炎，雖緊急送往竹東及新竹各醫院診治，無奈群醫束手、藥石罔效，就在送返家中料理後事之際，張石華一名素信神佛的同事見狀，囑其家人齋戒沐浴，在礦場工寮內臨時準備小桌，桌上擺放香爐、四果等供品，由在礦坑內負責推推車的礦工張善火主其事，[12] 代向張石華之弟張石龍所奉祀之關聖帝君像虔誠祈求，[13] 望關聖帝君能彰顯大能，挽救病危男童。此時，張善火突然起乩，口說神諭，經過賜符、服藥，5日後男童病體竟然痊癒，令觀者大嘆不可思議。[14]

此事過後，張善火便在每日晚餐後，在礦場工寮內代人向神明問事。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礦主詹清河對張善火之舉亦表贊同，[15] 但吩咐不得向人收費，同時

---

11 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志》，上冊，頁112-113；北埔鄉公所編，《北埔鄉概述》（新竹縣：北埔鄉公所，1998年），頁22。

12 張善火（1929-？），苗栗縣南庄鄉獅山村客籍人士。日治時期公學校畢業後，因家貧無法升學，而入礦場工作。據云因體質特異，在三峽的礦場工作期間，曾參與扶鸞活動，為人取藥治病。因張桂芳事件後，成為濟化宮開山宮主，亦曾任濟化宮董事長。參見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18。

13 張石龍，生卒年不詳，客籍人士。其妻謝勤妹曾在1953年間背部忽長毒瘤，至臺大醫院進行數次手術均未見效，其後病勢轉劇，在絕望中張石龍忽想起三峽白雞山行修宮的關聖帝君相當靈顯，遂步行20餘里，至殿前虔誠禱告，並求取靈丹讓謝勤妹服下，竟自此恢復健康，從此成為關聖帝君信徒。1957年，迎關聖帝君像定居北埔，在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擔任礦工，曾任濟化宮副主任委員。參見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20-21。

14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18。

15 詹清河（1931-1983），苗栗縣南庄鄉獅山村客籍人士，為濟化宮首任董事長。原擔任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主任，後因獅頭山煤礦礦主欲處分龐大礦產，第六礦場即由詹清河與數人出面承買，由其買下十分之七股份。之後詹清河利用出售煤礦所得，將一部分收益投入興建濟化宮之用。詹清河天性聰慧、外交手腕強，是使濟化宮廣開知名度的重要推手。參見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10-11；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免去他白天在礦場的工作，工資照付，讓他專心處理晚間的宗教事務，並由時任會計、身兼礦場股東的謝鏡清協助張善火，擔任錄筆一職。[16] 接著，出現了更多關於在第六礦場內經關聖帝君賜符、服藥而治癒的神蹟，包括身患痼疾、癱瘓在床數年之久的楊榮、黃世妹與魏介妹之癌症、徐春霞的關節炎，以及黃回生的腳氣病等。[17] 在短時間內，一傳十、十傳百，由近而遠，前來相求者日眾。

據稱在神蹟不斷彰顯，且不收取任何費用下，聲名遠播，原設於工寮辦公室內的簡易神壇，已無法容納在晚間蜂擁而至之信眾。因此，詹清河與張善火、謝鏡清、張石龍等人商議後，決意籌建一處專供各方信徒參拜之所，在靠近北埔鄉小南坑的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左側山麓尋得一地，興建廟堂。1961年9月間著手奠基，創建經費均由詹清河墊付，於同年11月完成開光登龕，經神諭賜名為濟化宮，以濟世化民，引人行善。[18] 濟化宮內主神奉祀關聖帝君，陪祀神祇則有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三官大帝、天上聖母、註生娘娘、瑤池金母、福德正神等。此原設於礦區工寮內的小神壇，自此逐日擴大規模。

當濟化宮正式創建後，從1962年起即展開包括：（一）擴建廟宇建築，如建設天堂、地府堂、西方、靈塔等；（二）設立醫院；（三）設立學院；（四）發展觀光事業；（五）設立獎助學金等五大事業為建設目標。其後為配合政府規定及確保宮內資產權利，1965年後，濟化宮先後設立管理委員會、董事會，進一步成立財團法人，創始有功人員如詹清河、張善火、張石龍、謝鏡清等人均是固定代表，由詹清河擔任首任董事長。[19]

---

16 謝鏡清（1933-），新竹縣新埔鎮客籍人士，為現任濟化宮董事長。曾於苗栗縣南庄鄉獅頭山勸化堂所設之書房學習古文，並協助管理靈塔入位、火葬場作業等事務。1956年役畢，即至獅頭山煤礦第六礦場任職，負責會計等相關庶務工作。當第六礦場出售時，受詹清河之邀，買下十分之一股份，更參與濟化宮之廟務。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17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7。

18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8；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志》，下冊，頁866。

19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8-9、28。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在詹清河運籌帷幄下，濟化宮持續發展硬體建設，廟務方面亦漸上軌道。另稱為彰顯主祀神關聖帝君之德、響應中央政府提倡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20] 而以闡揚中華固有文化道德、擴大社會救濟為名，舉辦一系列的公益活動。例如：從1975年起，發起表揚新竹縣各鄉鎮之模範孝子活動。之後數年，擴大辦理表揚活動，將模範孝子改稱孝悌楷模，選出400多人接受表揚，從中擇其15名事蹟較優者至濟化宮參加表揚大會，並邀請教育部、臺灣省民政廳、教育廳等官員，以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工作會（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今中華文化總會）及各級分會、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等要員參與活動。[21] 除孝悌楷模表揚活動外，1973年濟化宮舉辦了全國詩人聯吟大會；由於新竹縣北埔鄉是全臺客籍比例最高的地區，因地緣關係，加上廟方人員多屬客籍，也曾於1979年開辦客家民謠比賽，自第二屆起擴大為全國性客家歌唱比賽；1982年，舉行北區七縣市老人才藝競賽等。[22]

濟化宮透過舉辦表揚孝悌楷模、詩人大會、客家歌謠比賽，或關懷老者等各項活動，提升對外的知名度，同時藉由舉行活動，從而與社會及黨、政單位連結，試圖擴大濟化宮的影響力。緊接著，以詹清河為首的濟化宮領導階層，籌劃了更大規模的跨國行動，前往日本迎靈，將合祀於靖國神社、在二戰期間戰歿的臺籍日本兵亡靈「迎回」濟化宮奉祀。

---

20 自1950年以來，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在此情況下，藉由中共發生文化大革命，遂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關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探討，參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

21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45-46。

22 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誌》，下冊，頁867。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叁、前往靖國神社迎靈始末

根據濟化宮常務委員陳韜編寫之《濟化宮的回顧》，濟化宮之所以至日本靖國神社迎靈，乃因1979年間該廟奉祀的關聖帝君、觀世音菩薩降下乩示而起。透過乩生之口，經錄筆生將神佛的乩示整理成以下文字：

> 茲有臺籍日軍三萬多靈魂，慘死異域，其魂滯留日本國，無依無靠，成為日本的無祀孤魂，其情悲悽可憫！本宮係慈善機構，陰陽一體，有義務設法解救其魂回歸祖國奉安，供遺屬祭拜，享受馨香，以安其魂。[23]

此種以神佛悲憫之心交辦「設法解救其（指臺籍日本兵）魂回歸祖國奉安」的說法，一直是濟化宮對外宣稱前往靖國神社迎靈的緣由。不過，有關濟化宮至靖國神社迎回臺籍日本兵亡靈安奉的構想，尚存在不同來由：一說是濟化宮董事長詹清河對外聲稱早年有許多礦工曾私下向其提起，二戰時有親友被日軍徵召參戰，戰死後入祀日本靖國神社，遺族在戰後必須遠赴日本追悼，不僅十分不便，且花費鉅額旅費，因此成為濟化宮後來向靖國神社迎靈的發端。[24]除此之外，尚有起自一名居於臺北的日本女性赤堀敏子之說。臺籍日本兵戰後向日本政府求償行動，起於1974年李光輝（中村輝夫）在印尼摩羅泰島（Morotai）的叢林被發現，翌年日本政府對其所做的人道補償為開端，始有臺灣方面的當事人以較積極的方式展開行動。[25]臺灣民間曾先後組成20餘個討債團體，向日本政府求討銀行儲金、軍屬郵便存款、未給付給予及遺骨埋葬費等，[26]據稱赤堀氏便與當時某討債團體關係密切。[27]赤堀敏子更計劃透過募款先在臺灣建廟，再向靖國神社交涉分靈，[28]安奉在二戰期間戰死之臺籍日本兵亡靈，然而其為何有此念頭則不得而

---

23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3。

24 〈濟化宮透過靖國會迎亡靈〉，《中國時報》，臺北，2005年6月15日，版4。

25 林志剛，〈人權的演繹（上）：原臺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律師通訊》，第172期第1期（1994年1月），頁40。

26 〈向日本索債團體林立糾紛迭起．債權人迷惘．政府機關應予輔導〉，《聯合報》，臺北，1982年11月10日，版3。

27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東京：おりじん書房，1986年），頁171。

28 所謂的分靈、分祀概念相類，也就是欲從靖國神社合祀中，將部分的靈魂分別出來。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知。而詹清河在因緣際會下，得知了赤堀氏正籌劃向靖國神社提出分靈之事，進而落實此發想。[29] 另有一說係詹清河曾參加由臺灣某討債團體組織的參拜團，前往靖國神社及安置二戰中在海外喪生身分不明者遺骨的千鳥之淵（千鳥ヶ淵）戰歿者墓苑參拜，從中得知戰死的臺籍日本兵亦奉祀在內，於是產生將其中臺灣人亡靈帶回宮內的想法。[30]

是時濟化宮的大型建築十地寶塔（即所謂靈塔）已漸次建設完成，為其五大事業中最大的建築事業，被廟方視為將來主要經費的來源之一。從1975年5月起建（至1997年方全部完工），寶塔原先的設計有11層，但考量建築高度不能高於主殿，因此改建為7層，塔高130餘公尺，建地200餘坪，塔內設有靈位多達10萬座。[31] 除了向信徒及民眾宣傳、推銷將先人靈骨奉祀於靈塔的好處有：「奉塔安養，可免風吹日曬」、「能永久保存祖先骨骸」、「省下尋求風水地穴之麻煩」、「每年享有春、秋二祭，每日由本宮供奉茶果，受萬人之香煙，為後裔者足可安心也」等說詞外，或基於積極拓展十地寶塔內塔位的使用量，濟化宮董事長詹清河可能憶起當年礦工所提及之事，或借用如赤堀敏子的計畫、抑或從參與討債團體活動的經驗，思考可行路線，再配合前述陳韜所記神明乩示，遂展開向靖國神社協商分靈的行動。[32]



圖1、濟化宮十地寶塔（左）、軍魂靈位牌總牌位（中）及個人靈位牌（右）
資料來源：陳柏棕拍攝（2018年10月14日）

29 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30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頁169。
31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41-43、58。
32 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濟化宮透過靖國會迎亡靈〉，《中國時報》，2005年6月15日，版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因詹清河不諳日語，與日本方面的交涉事宜，主要仰賴時任濟化宮總幹事的廖仰霖居中協助。廖仰霖係出身竹東的客家人，日治時期畢業於臺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今國立宜蘭大學），戰後在新竹的公務機關任職，退休後即至濟化宮服務，因嫻熟日語之故，便受詹清河請託協助辦理與日方協調迎靈之事。[33] 由於濟化宮領導似曾參與討債團體舉辦的活動，和討債團體相關成員或有接觸，其後，他們透過和臺灣討債團體往來甚密、據云係向靖國神社迎靈之發想者赤堀敏子之引介，與日本的右翼民間組織靖國會取得聯繫，遂動身前往日本，拜會該會事務局長塙三郎等人。[34] 經詹清河、廖仰霖等廟方人員數度往返拜訪協商，而靖國會塙三郎等一行人亦曾多次到訪濟化宮，實地勘查安靈所在的十地寶塔，認為寶塔內部莊嚴華麗，實乃奉安亡魂的美好場所，表達出認可之意。[35]

當濟化宮領導階層尚與日本相關人士商談分靈階段，廟方內部早已展開迎靈前置作業。當年負責書記業務的謝鏡清指出，為此他們已先行刻製題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同胞　軍英靈神位」字樣的軍魂靈位牌總牌位，作為濟化宮成員前往靖國神社召靈之用。此外，按照詹清河提供的《祭神簿》，[36] 為《祭神簿》內所有的臺灣人「祭神」設製塑膠材質的靈位牌，再由謝鏡清及動員而來的北埔國

33 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34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頁171。靖國會非屬靖國神社編制內組織，該會成立於1960年，係為保守派尊皇團體，以捍衛靖國神社及維護國體為宗旨。關於靖國會的組織沿革與相關主張，參見http://yasukunikai.com/（2018/12/24點閱）。

35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3-54。2018年10月14日，筆者前往濟化宮訪查，詢問有關1982年間，濟化宮前往迎靈相關事宜，至今濟化宮的幹部仍表示當年靖國神社曾派出代表前來宮內訪視十地寶塔；而董事長謝鏡清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則明確指出前來者為塙三郎，似乎將靖國會成員視為靖國神社的當然代表。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36 靖國神社採取合祀形式，將死者名字登載在所謂《靈璽簿》上，《靈璽簿》則依據《祭神簿》（計劃合祀人員名單）而來，戰前由陸、海軍負責製作，記載陣亡者的階級、姓名、死亡日期、死亡區分（戰死、病死）、死歿場所、本籍、現住地、遺族等資料。不過，《祭神簿》的功用主要為祭祀之用，並非作為士兵從軍資料的整理，因此單一兵士的部隊資料、個人戰歷、賞罰等均不在紀錄之列。參見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第10期，頁69。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小教師，用黑色油性筆在每座靈位牌寫上「故某某某靈璽」，總共製作了3萬餘座靈位牌。[37]

按照陳韜在《濟化宮的回顧》的說法，經過詹清河與廖仰霖等人數次往返臺、日之間，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日方認定濟化宮此一迎靈團體，顯然有別於臺灣其他討債團體，認為此事純屬善舉，而由國會將此事函送靖國神社，就分靈一節再行磋商，經靖國神社認可並同情亡魂的孤寂，立即同意濟化宮招魂回臺。[38]隨後，由詹清河率領濟化宮成員共120人，組成濟化宮迎靈參拜團，搭乘專機前往日本，一行



圖2、濟化宮迎靈參拜團

說　　明：1982年10月24日攝於靖國神社。
資料來源：「新竹北埔南天山濟化宮與二戰臺籍日軍靈璽」網站，網址：http://oursogo.com/thread-2063256-1-1.html（2018/12/24點閱）。

37 此即意味著董事長詹清河等人與靖國神社交涉期間，早已事先取得了《祭神簿》。至於《祭神簿》的來源，除宣稱是靖國神社授權交付的說法外，其後廟方曾改稱為靖國會提供，或有對外收購而來之說，來源眾說紛紜。〈濟化宮宣稱迎回靈位・靖國神社指純屬子虛〉，《聯合報》，1983年2月28日，版3；〈北埔濟化宮臺籍日軍亡魂安息所〉，《中國時報》，1998年8月17日，版19；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38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3-54。透過這本濟化宮於1997年所編輯的刊物可知，編者仍將迎靈定調為取得靖國神社授權。然而在1982年10月，濟化宮正式對外宣布迎靈回臺消息後引發爭議之際，曾轉而表示係透過靖國會進行迎靈事宜。見〈濟化宮宣稱迎回靈位・靖國神社指純屬子虛〉，《聯合報》，1983年2月28日，版3。

人捧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同胞　軍英靈神位」軍魂靈位牌至靖國神社招魂，將3萬餘名戰歿的臺籍日本兵亡靈「迎回」臺灣。[39]



圖3、濟化宮十地寶塔供奉戰歿臺籍日本兵牌位的內部陳設空間

資料來源：陳柏棕拍攝（2019年3月31日）

回臺後，軍魂靈位牌總牌位安奉於濟化宮十地寶塔4樓的英靈華藏殿；3萬餘座靈位牌則安置於3樓，其內部設置了混凝土製成之棚架，按照日本統治時期5州、3廳的行政區劃分，共分為30排，每排11段，分別安奉這些靈位牌。至此，終於達成了詹清河的目標，一舉將多達3萬餘名臺籍日本兵之靈位牌入祀於濟化宮的十地寶塔。更在1982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當日盛大舉行第一次的祭祀法會，[40] 正式對外宣布濟化宮從日本靖國神社迎回臺籍日本兵亡靈的消息。

39　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先生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40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肆、後續引發的爭議及影響

當濟化宮的「迎靈」專機抵臺，大批遺族不惜中斷工作，湧入機場接機。[41] 隨後在廟內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一時之間使得濟化宮備受矚目，吸引全臺各地的遺族前來謁陵及查閱名冊。[42] 陳秋即是當時前往濟化宮祭拜的二戰遺族，據其表示係經親屬轉知，乃知濟化宮向靖國神社迎靈之舉，旋與親族一同前往參拜亡父的靈位牌。[43] 不少遺族眼見寫有至親姓名的靈位牌，情緒失控伏於靈位牌前放聲哭嚎，在參拜之後滿懷謝意踴躍捐款，將300、500、1,000元不等的捐獻金投入濟化宮的賽錢箱。[44] 1982年臺灣省政府民政廳進行的全國寺廟收益調查，即可發現濟化宮在當年度的慈善捐款收益高達1,000萬元以上，在全國寺廟當中名列前茅，[45] 這或許是濟化宮因迎靈而博得善舉美名外，所帶來更大的額外效益。

濟化宮進行迎靈期間，臺灣民間對日求償運動方興未艾，不同名義之討債團體林立，時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的馬樹禮，便觀察到這些討債團體彼此之間交相攻訐，相互排斥，各為自己爭取成為唯一代表遺族的合法團體之亂象。[46] 此外，在許多民間討債團體當中，不少惡德者藉求償為名，廣收會員，詐欺斂財，頻生糾紛。除了大肆在臺灣各地舉辦說明會，收取手續費外，甚至亦聞有發行「討債股份」以合股方式經營者，喧騰一時。[47] 而濟化宮此舉，也在當時引發諸多爭議。

濟化宮在與靖國會交涉過程中，雖取得特定討債團相關人士的協助，然當迎靈事成之後，卻很快地遭到組織規模最大的民間討債團——臺灣同胞原日本

41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頁170。
42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4。
43 陳秋女士電話訪談，2019年6月30日。
44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頁172。
45 〈從慈善捐款看寺廟收益〉，《聯合報》，1983年5月11日，版2。
46 馬樹禮，《使日十二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頁121。馬樹禮（1909-2006），江蘇漣水縣人，於1973至1985年間擔任駐日代表。
47 林志剛，〈人權的演繹（上）：原臺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律師通訊》，第172卷第1期，頁42。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軍人軍屬之軍貯欠餉死傷恤償討還代表團（以下稱代表團）指控其所宣稱自靖國神社取得之陣亡臺胞名單（即《祭神簿》）實從該團抄錄，[48] 懷疑濟化宮迎靈之舉為「藉機斂財」。代表團曾去信向靖國神社查證，確認社方並無同意分靈及提供名冊之事；[49] 而《聯合報》派駐日本東京記者亦向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求證濟化宮迎靈一事是否屬實，松平氏向記者表示，濟化宮董事長詹清河確因此事自1982年8月起與他不斷接觸，在8月19日，便向松平提出提供名冊（《祭神簿》）及分靈的請求，因靖國神社向無分靈前例，而且神社的名簿上僅登記戰死者姓名、階級及死亡地點，無法分辨臺籍日本兵之身分，於是當下拒絕詹清河的請求。詹清河遭松平回絕後，另提出希望爾後帶團前來神社參拜時，能准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同胞　軍英靈神位」軍魂靈位牌進行祭拜儀式，松平雖表同意，仍憂心此舉將造成外人誤認為靖國神社已同意分靈，囑咐他必須謹言慎行。[50]

1982年9月9日，詹清河再度去函，隨信附上「南天山靈璽宮設立計畫書」，請求靖國神社為該靈魂安奉之所命名，同時邀請松平永芳揮毫賜匾，並請其接待預定於10月24日由詹清河帶領前往祭拜之120名濟化宮關係人。但是靖國神社在9月16日的回函裡即表明了明確立場：「名稱問題乃貴宮本身問題，本神社無意參與；至於期望宮司揮毫之事，則請自尋貴國適當人選；而關於來社參拜，可以，但參拜方式必須與其他團體完全相同」，以此回絕詹清河在來信中「請予特別照

---

48 臺灣同胞原日本軍人軍屬之軍貯欠餉死傷恤償討還代表團，是臺灣民間規模最大的討債團，總代表為黃同吉、副總代表由李謀茂擔任，會員包括臺籍日本兵及遺族，人數多達數萬人。1977年6月，該團獲靖國神社宮司池田良八授權，取得由社方提供之《合祀通知狀》2萬8千枚、《祭神簿》27冊，委託該團代為轉發臺灣遺族。然《合祀通知狀》、《祭神簿》卻遭內部成員私下擅自影印，轉賣予其他討債團謀利，迫使靖國神社社方取消代表團的代理權，同時宣告臺灣方面持有的《合祀通知狀》、《祭神簿》為無效文件。1990年11月，代表團總代表黃同吉（已於1977年病逝）之子藉臺、日戰友會於臺中寶覺禪寺設立慰靈碑之際，將靖國神社授權的《祭神簿》原件，寄放於寶覺禪寺，永久保存，並供人參拜。見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頁38-41、180；〈林招治女士訪問記錄〉，收入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453-456。

49 〈向日本索債團體林立糾紛迭起．債權人迷惘．政府機關應予輔導〉，《聯合報》，1982年11月10日，版3。

50 〈濟化宮宣稱迎回靈位．靖國神社指純屬子虛〉，《聯合報》，1983年2月28日，版3。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撫」的要求。[51] 從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所取得宮司松平永芳的聲明，或可窺知靖國神社明白地切割了濟化宮所宣稱的整起分靈與迎靈行動，一切皆與該神社無關。

在靖國神社內供奉近250萬名的死者，並無實際之靈牌或靈位，係將死者名字登載於《靈璽簿》內，《靈璽簿》則依據計劃合祀人員名單之《祭神簿》而來，死者的靈魂計算單位為「柱」，作為祭神之死者在姓名後再冠上「命」字，祭祀方式則為合祀，在此信仰體系內沒有存在所謂分靈的概念，也就得以理解社方為何反對濟化宮所提出的分靈一事。另外，在來自臺灣的濟化宮提出分靈要求事件後，日本中曾根內閣也曾試圖進行甲級戰犯的分祀計畫，[52] 官房長官後藤正晴透過靖國神社奉贊會會長大槻文平，於1986年2月27日前往靖國神社與松平永芳宮司會談，商討能否撤銷對甲級戰犯的合祀問題，松平永芳斷然向後藤表示：

> 這絕對辦不到。神社設裡有「座」，就是給神坐的坐墊。和其他神社不同，靖國神社裡只有一個「座」。250萬魂靈坐在同一個坐墊上，不能把他們分開。[53]

松平永芳進一步指出一經合祀為神，祭祀就不能撤銷，主張撤銷合祀或把一部分神祭祀到別的神社裡，這本來就是對祭神的褻瀆，絕不能贊同這種做法。[54] 由此可知，松平永芳基於教義明白反對分祀的立場。而早在濟化宮與中曾根內閣提出分靈、分祀之請求前，1979年2月，便曾有臺灣的原住民遺族代表團赴日，向靖國神社提出了撤銷合祀的要求，但是他們的要求旋遭到靖國神社的拒絕。從時任靖國神社宮司池田良八權的談話，即能了解靖國神社拒絕以國籍身分為理由撤銷合祀的立場：

---

51 〈濟化宮宣稱迎回靈位．靖國神社指純屬子虛〉，《聯合報》，1983年2月28日，版3。

52 甲級戰犯（class A war criminals），指符合國際法之下，針對侵略戰爭的計畫、準備、開始、施行與共謀的犯罪，從而以「反和平罪」（Crime against Peace，甲級犯罪 ）於遠東國際軍法庭遭起訴者，也就是在東京審判中被告人的通稱。「反和平罪」—甲級犯罪的負責人，從而被當作「甲級戰犯」。見日暮吉延著，黃耀進、熊紹惟譯，《東京審判》（臺北：八旗文化，2017年），頁20-21。甲級戰犯為荒木貞夫、東條英機等28人。1978年，靖國神社將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以昭和時代的殉難者身分進行合祀。

53 高橋哲哉著，黃東蘭譯，《靖國問題》（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年），頁111-112。

54 高橋哲哉著，黃東蘭譯，《靖國問題》，頁112。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 戰死時他們是日本人，所以死後不可能不是日本人。他們是作為日本的士兵、懷著死後能被祭祀在靖國的心情而戰死的，所以不能因為遺屬們的要求就撤銷合祀。既然是他們自己要求和內地人一樣協助作戰、自己要求作為日本人參加戰鬥的，那麼，被祭祀在靖國神社就是理所當然之事。在臺灣，大部分遺屬對合祀是持感謝態度的。[55]

因此，無論就教義上或身分上，靖國神社均未認可撤銷合祀或進行所謂的分靈，除了合祀形式，社方摒除了任何做法。於是，靖國神社透過臺灣的媒體否認濟化宮所謂的迎靈及交付名冊之說，松平永芳宮司更將與詹清河的來往信函，交寄臺灣有關單位進行調查，同時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阻止濟化宮辦理相關祭祀活動。[56] 面對靖國神社的嚴正聲明，一直以來對外宣稱經靖國神社正式授權的濟化宮，從而改口稱係透過靖國會迎靈，戰死臺胞名冊亦由該會提供，而非靖國神社。[57] 在迎靈一事上前後不一的說法，使得濟化宮的所作所為不免令人霧裡看花，並且飽受部分輿論批評。

隨後，濟化宮也因1983年董事長詹清河驟逝而爆發財務危機。自1979年起，濟化宮因向靖國神社迎靈動用了可觀的資源，期間人員數度往返臺日之間，直至迎靈回歸靈塔安奉為止，一切開銷董事長詹清河均未報帳，以致遺留下龐大的債務，共積欠1,800萬餘元，因濟化宮無力償還而遭到法院強制接管。其後法院及債權人委任張善火代理董事長，分期還債，至1996年方清償所有債務。[58]

伍、社會觀感的轉化

有關濟化宮的評價，在1990年代之後明顯發生轉折，已不見在1980年代初期，濟化宮對外宣稱由靖國神社迎靈回臺時，遭受輿論質疑的聲浪，對於迎靈之

---

55 高橋哲哉著，黃東蘭譯，《靖國問題》，頁137-138。

56 〈濟化宮宣稱迎回靈位．靖國神社指純屬子虛〉，《聯合報》，1983年2月28日，版3。

57 〈日靖國神社否認臺胞靈位被迎回〉，《聯合報》，1983年2月26日，版3。

58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頁56-57；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志》，下冊，頁867。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舉多轉為正面認定。以下將從濟化宮在特殊時空脈絡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嘗試分析其造成社會觀感轉變的原因。

一、提供部分遺族對日求償資料

臺灣民間除了有討債團體對日本政府的求償行動外，隨著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解除了在臺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令，臺籍日本兵因此得以迅速地組織起來，一再以遊行、上書抗議的訴求在臺灣各地展開陳情運動；[59] 在日本當地則有臺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以下稱思考會）進行活動。思考會係由明治大學副教授、兼在日臺灣同鄉會副會長王育德發起，1975年2月在東京一橋學士會館成立，明治大學教授宮崎繁樹接受王育德之邀出任該會會長，主要會員為原日本軍人，以臺籍日本兵的舊時長官或同僚居多。思考會為義工團體，無會規、毋需繳納會費，成立目的在於使日本政府落實對臺灣人戰歿傷者之補償。[60] 經各方有心人士多年奔走，終使日本國會及內閣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以特別立法的方式針對臺籍日本兵的索賠問題做出回應。

自1987至1988年5月間，日本政府陸續通過制定「關於對臺灣居民陣亡者遺族支付特定弔慰金法」、「關於支付特定弔慰金實施法」、「關於支付特定弔慰金實施之施行令」、「關於支付特定弔慰金實施法施行細則」等法令，戰死的臺籍日本兵弔慰金額一律定為每人日幣200萬元，統一交付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代辦申請作業。戰死者遺族在提出申請時除了必須檢附特定弔慰金等支付申請書、戶口謄本等基本資料外，尚需填妥特定的書表，譬如包括死者姓名、出生日期、原身分與簡歷、死亡日期、場所、原因及其他可資參考事項等之「死亡狀況陳述書」，抑或是可資證明死亡者身分及因公死亡之文件，例如軍隊手冊、履

59 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第3卷第1期（1996年6月），頁198-199。

60 參見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臺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頁335-339；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第3卷第1期，頁190。

歷、工員、雇傭人或船員手冊、徵用令、軍郵帳、悼辭、香奠簿、碑文或墓誌照片、日記、信件、手冊、照片等，資料提出愈充分愈可能獲得裁定認可。[61]

濟化宮保存的《祭神簿》或許就在此刻發揮了作用，因《祭神簿》登載了關於陣亡者詳細之死亡日期、場所、原因等資料，對苦無戰歿親屬資訊之遺族而言有莫大助益，當他們向日本政府申請弔慰金、填寫「死亡狀況陳述書」時，《祭神簿》可以作為具體的參考依據。濟化宮表示在此期間，遇遺族有缺乏資料者前來相求，廟方均無償提供查詢及複印，據稱遺族經由濟化宮出具證明，有超過百分之六十者順利領得弔慰金。[62]

由於濟化宮義務協助遺族查詢、取用《祭神簿》內之死歿親屬個人資料，以取得向日方申請弔慰金之依據，許多受惠之遺族均表感佩，或許是濟化宮從迎靈回臺後歷經質疑、批評的十年，逐步贏回輿論肯定的一個重要契機。

二、成為遺族尋親探源之地

戰爭為臺灣人原有的日常帶來不可逆的轉變，戰事雖然在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但是戰爭帶來的改變卻未因停戰而終止，特別是喪失至親的遺族成為受戰爭遺留效應影響最深刻的一群。戰爭中共有3萬餘名臺灣人戰死，意味著在臺灣就有3萬多個家庭遭逢劇變，然而戰後隨政權轉移，在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情結的影響下，遺族是受到漠視的群體。藍適齊指出在臺灣，戰後關於「遺族」的討論——與整體的臺灣二戰歷史記憶相同的情況——都受到長時間的忽略、甚至壓抑。在戰後的臺灣，似乎連「臺灣人二戰遺族」這個概念都不存在。[63]

---

6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編，《代發「臺籍原日本兵陣亡、重傷殘者弔慰金」申請須知》（臺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1988年），頁1、13-14。

62 〈引渡臺籍日兵軍魂超渡列冊．北埔濟化宮幫兵佚遺族尋親義舉獲好評〉，《中國時報》，1991年9月25日，版15。

63 藍適齊，〈「喪失」在戰爭（記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民家庭〉，「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年8月15-16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對遺族來說，戰後首要面對的是家人在戰場上喪生的問題，誠如學者一ノ瀨俊也所言，如何得知至親遺骨的行蹤及最後狀況，形成戰後遺族一個未解的習題。[64] 日本戰後對在海外喪生的軍人、軍屬展開了一系列的行動，據浜井和史的歸納，這些行動包含：歸還遺骨、派遣遺骨收容集團、在海外設立紀念碑、遺骨歸還本國後的處理及收容等。鑒於後續舉行慰靈祭所需，與支給死亡撫卹金等因素，日軍在復員之際，即向海外部隊下達「外地部隊留守業務處理要領」的命令，以遺骨、遺物歸還作為優先處理事項。而正式的處置作業，則是在1952年4月「舊金山和平條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生效，聯合國結束占領日本後展開。此時，日本政府開始對外交涉，取回遺骨，並組織遺骨收容集團，前往太平洋諸島、東部新幾內亞、所羅門諸島、緬甸、印度、西部新幾內亞、婆羅洲、菲律賓等地收拾遺骨，同時在發掘遺骨當地設立小型戰歿日本人之碑，進行「現地慰靈」。而當遺骨歸還日本後，經厚生省引揚援護局暫行安置，除送交遺族外，多數遺骨再安奉於1959年3月新設的千鳥之淵戰歿者墓苑。[65]

遺骨的收集與歸還，不但使遺族得以安祀（埋葬）死去的親屬，而且這些戰後處理議題，也讓戰後的人有機會能了解那群葬身海外者所經驗的歷史。相對於日本政府對戰歿者的處置，臺灣的遺族缺乏家人如何死去的完整資訊，連喪生家人的遺體都沒有見到、也未收回任何屍骨，他們與喪生在戰場上的家人一直存在著未了的關係。臺灣遺族一方面因為缺乏資訊，他們未能正常面對、接受親人的喪生，也未能做正常、妥善的處理或完結；另一方面，因為沒有遺體／遺骨、沒有喪禮、沒有埋葬，也沒有真正的墳墓（只能建替代性的衣冠塚），他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對象／物件或是地點／空間，可以對死去的親人進行「紀念」。也因此，遺族在戰後都持續的存有一種對紀念親人「喪生」未竟的「渴求」。[66]

---

64 一ノ瀨俊也，《銃後の社会史—戦死者と遺族》（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頁174。

65 浜井和史，《海外戦没者の戦後史：遺骨帰還と慰霊》（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年），頁110-111、156、172。

66 藍適齊，〈從比較的脈絡對臺灣人二戰史的反思：跨國性的臺灣人二戰主體〉，「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除此之外，礙於不符合國族框架，遺族在日本軍隊裡服役而戰死的親人，被中華民國政府排除表彰的資格，無法享有國家祀典之榮譽，因此在臺灣沒有一個國家紀念空間或紀念碑，獻給二戰中在戰場上喪生的3萬多名臺灣人。在缺乏關於親人如何喪生的完整資訊，又沒有足供紀念親人喪生的「物件」或「空間」的情況下，遺族無法正常而持續的對親人的「喪生」進行紀念，[67] 因此供奉著3萬餘名臺籍日本兵戰死者靈位牌的濟化宮，成為許多臺灣二戰遺族追悼親屬的一個具有象徵性紀念意義之所在。

另一方面，伴隨解除戒嚴，臺灣當局放寬對社會的管控，過往行事低調、由臺籍日本兵組織的戰友會，開始公開進行慰靈活動，[68] 以悼念在戰爭中犧牲的同袍。1990年11月，經臺、日陸海軍戰友會努力之下，終於在臺中市區的寶覺禪寺建立了「和平英魂觀音亭」及「靈安故鄉紀念碑」，為臺灣首座二戰紀念碑；[69] 1995年，尚有臺、日海軍戰友會共同於屏東縣恆春鎮貓鼻頭的潮音寺設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海軍巴士海峽戰歿者慰靈碑」；[70] 甚至在1997年，出現由前比島俘虜監視員組織的關聖帝君會在菲律賓呂宋島中部內湖省Los Baños的百勝灘（Pagsanjan），豎立海外第一座臺灣人的二戰紀念碑「臺灣同胞受災者安靈慰魂碑」。[71]

由於戰友會發起紀念死難同袍的慰靈活動漸次活絡，而當求償行動告一段落之後，戰死的親人之於遺族而言，也回歸單純的追悼、抑或重新記憶，濟化宮便

---

67 藍適齊，〈從比較的脈絡對臺灣人二戰史的反思：跨國性的臺灣人二戰主體〉，「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

68 所謂戰友會係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編屬同部隊、船艦，擁有共有經驗者，在戰後集結成立之團體。見戦友会研究会，《戦友会研究ノート》（東京：青弓社，2012年），頁70。

69 關於寶覺禪寺內臺籍日本兵的建碑行動，參見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編，《和平英魂觀音亭：靈安故鄉紀念碑落成慶典暨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臺中：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1990年）。

70 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海軍巴士海峽戰歿者慰靈碑」碑文。筆者至屏東縣恆春鎮下泉路之潮音寺調查，2011年11月26日。

71 參見林東溪、張阿祿編，《關聖帝君會員》（臺北：信安診所吳子欽醫師私家版，1997年），頁182-185。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提供了可供憑弔的公開場域。或有部分的遺族向日本政府申請弔慰金期間，前往查詢親屬資料，與濟化宮已有接觸之故，開始定期參與濟化宮於每年4月及10月舉行的春、秋兩回祭典，[72] 從每回祭典均有大批遺族前來參與祭儀來看，濟化宮似乎成為遺族祭祀與悼念先人的固定地點。[73]

除了春、秋兩祭外，遺族平日前來濟化宮祭祀，只要向廟方說明戰亡親屬姓名、出身地等基本資訊，便可由《祭神簿》內查詢到個人資料，即有遺族表示相較收存在臺中寶覺禪寺內的《祭神簿》僅於每年中元節開放瀏覽，濟化宮之《祭神簿》則是在辦公時間內隨時可查。[74] 其後，再將《祭神簿》中查找到的資訊謄於紙條上，交由廟方人員引領至十地寶塔內尋得親屬靈位牌。確實有許多遺族在濟化宮內尋得親人的蹤跡，王塗發便是在此找到親屬下落之例。

前立法委員王塗發是二戰遺族，他的父親王其論當年新婚不久，旋受日軍徵調至南洋從軍，自此失蹤。母親因為丈夫始終下落不明最後選擇改嫁。王塗發提起每當母親談及這段往事時，常常淚流滿面，希望他無論如何一定要尋得王其論的下落。2005年，王塗發得知在北埔濟化宮內安祀戰歿臺灣人英靈的消息後，旋安排前往祭拜。在濟化宮，王塗發仔細翻閱了《祭神簿》，終於找到父親王其論的資料，並請託廟方將靈位牌移出靈塔，虔誠地替父親上了香。他由衷感謝濟化宮在過去20餘年義務替他父親入祀，立牌位祭祀，回高雄後，即將這項好消息告訴所有的親朋好友。[75]

---

72 濟化宮舉行之春祭拜塔追思法會為每年4月5、6、7日3天；秋祭則為10月19、20、21日3天。見財團法人南天山濟化宮編，《民國108（2019）年農民曆》（新竹：財團法人南天山濟化宮，2019年），未註頁碼。

73 〈北埔濟化宮秋祭人潮洶湧〉，《中華日報》，臺北，1996年10月17日，版17；〈番社庄聯合伯公廟酬神祭．北埔濟化宮超渡臺籍軍伕〉，《中央日報》，臺北，2003年10月27日，版7；〈北埔濟化宮供奉臺籍日軍英靈〉，《中國時報》，1996年10月27日，版14。

74 見「神靖丸．紀念不幸陣亡的臺灣醫師．醫療助手．農業生產人員．1945年1月12日」網頁，網址：https://shinseimaru.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html（2019/6/27點閱）。

75 〈濟化宮透過靖國會迎亡靈〉，《中國時報》，2005年6月15日，版4；「王塗發立委前往北埔濟化宮尋獲父親靈位」網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164576681&sk=photos&collection_token=1164576681%3A2305272732%3A69&set=a.4975966794678&type=3（2018/12/30點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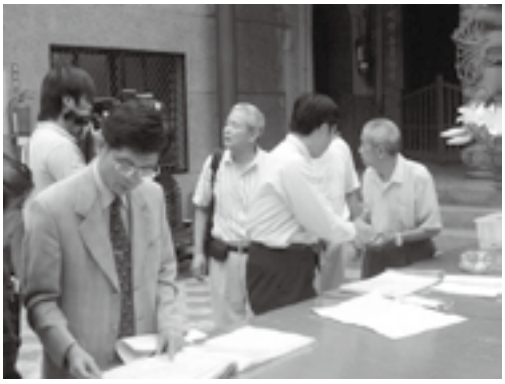



圖4、王塗發至濟化宮祭拜

說　　明：查閱《祭神簿》（左）；捧奉父親王其論之靈位牌（右）
資料來源：「王塗發立委前往北埔濟化宮尋獲父親靈位」，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164576681&sk=photos&collection_token=1164576681%3A2305272732%3A69&set=a.4975966794678&type=3（2018/12/30點閱）。

王塗發經由《祭神簿》取得父親王其論的具體「下落」，再向父親專屬的靈位牌進行慎重的祭祀，通過此種兼具具體及象徵性的儀式，不但完成了母親的託付，替她「尋獲」了丈夫王其論，同時也滿足身為人子悼念父親的心理需求。這樣的情境也同樣體現在張金章的遺族身上。

張金章出生於1925年，臺南州白河庄關子嶺（今臺南市白河區）人，從遺族保存其身著日本海軍軍裝的畫像，加以判斷其於《祭神簿》內記載之階級（海上兵，即海軍上等水兵）、死歿時間及原因（19.11.10、戰死，即昭和19年11月10日戰死）、地點（九州西方海面）等資訊，[76] 一併參照相關研究資料，研判張金章的身分為海軍特別志願兵，且受訓成績優異，被軍方選至日本內地的海軍學校培訓。1944年11月7日，包含張金章在內的300名水兵，在基隆搭乘特設巡洋艦護國丸赴日，於10日凌晨在九州西方外海遭受美軍潛艦伏擊，造成護國丸沉沒，張金章則連同211名臺灣水兵不幸喪生。[77]

76　參看靖國神社，《祭神簿》（臺南州之部），新竹北埔濟化宮藏。

77　1944年11月7日，特設巡洋艦護國丸於基隆港搭載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300名水兵赴日，於10日凌晨在九州西方外海遭美軍潛艦擊沉，造成船上324人死亡，其中包含212名臺灣海軍特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張金章戰歿後，其出征前在軍隊裡留下的頭髮及指甲（作為戰死後替代遺骨之用）送至張家，其寡母悲痛不已，終其一生從未釋懷喪子之痛。雖然張金章身後僅存一張畫像供遺族憑弔，但是張家未曾遺忘這位早逝的親人，至今其畫像仍供奉在臺南白河關子嶺的張家祖厝。除了於自家祭祀外，張金章的遺族未曾聽聞濟化宮至靖國神社迎靈之事，更無從得知在該宮十地寶塔內供奉張金章的靈位牌，[78] 當他們得悉在濟化宮安奉戰歿臺籍日本兵英靈的訊息時，立即表明前往參拜的意願。

2019年3月，張金章的遺族至濟化宮，經向廟方人員提供親屬姓名、出身地等基本資訊後，隨即在《祭神簿》中找到了資料，尋得安奉於十地寶塔內的靈位牌，並於靈位牌前燃香跪拜、長久默禱。一如王其論遺族之感受，張金章的遺族對於濟化宮提供給戰歿親人如此幽靜的長眠環境，甚感安慰，也向濟化宮長年以來無償安奉至親，表達由衷的謝意，表示將通知其他家族成員，擇日再一同前來祭拜。



圖5、張金章遺族參訪濟化宮

說　　明：由廟方人員查詢登載於《祭神簿》的張金章資料（左）；結束參拜儀式後，遺族特別向濟化宮幹部致意（右）

資料來源：陳柏棕拍攝（2019年3月31日）

別志願兵。關於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從軍史，以及搭乘特設巡洋艦護國丸的遇難始末，可參閱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年）；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市：月熊出版，2018年）。

78 張金章的生平及事蹟，係作者在2019年3月27日電話訪談其家屬，以及於3月31日在濟化宮由家屬陳述得來。

陳冬是另一位在濟化宮完成「尋親」的二戰遺族。陳冬的父親陳世鐘，1916年生於新竹州大溪街中庄（今桃園市大溪區中新里），為陳家七子中的次男，自溪西公學校（今桃園市大溪區中興國小）完成學業後，在家務農，曾三度主動應募，前往戰地。[79] 1938年4月，陳世鐘參加了由臺灣總督府組織的第一回臺灣農業義勇團，編屬新竹州隊，該團被派遣至中國上海軍農場，協助日本陸軍生產軍糧，直至翌年8月期滿歸臺，在《臺灣農業義勇團誌》內的名單中，便留有他的姓名，或為其首次從軍紀錄；[80] 至於陳世鐘二度從軍的資訊不明，可以知道的是當他第三度從軍之際，已婚並育有兩女，而此番出征後未再歸來，根據《祭神簿》記載的資料顯示，1945年1月1日，他以海軍軍屬的身分，戰死於菲律賓的馬尼拉。[81]

陳世鐘戰死後，其遺孀李甘獨自扶養陳秋、陳冬兩幼女，終身未再改嫁，直至2015年以99歲高齡辭世；[82] 陳世鐘的次女陳冬，在出生3個多月時，父親便前往戰地，從此未歸，她僅能透過其他家族成員的回憶，以及靈媒、卜卦的方式，取得和父親有關的信息，為自己建構父親的形象。[83] 及長，陳冬與長姐各自出嫁，礙於臺灣民間傳統習俗，無法奉祀死去的父親，令她長年掛念。因為忙於家庭瑣事，陳冬不曾注意濟化宮在1980年代進行的迎靈之舉，[84] 多年後當陳冬得知該宮安奉戰歿的臺籍日本兵靈位牌時，即啟程前來祭拜她的父親。陳冬在濟化宮參拜時說道：

> 我覺得濟化宮很有心，幫助我們這些人（遺族）可以有祭拜親人的地方。我跟我爸說，只要讓我身體健康，之後這裡（濟化宮）舉辦法會，我就會再來參拜。[85]

---

79 陳五常祠堂管理委員會重修，《陳氏族譜》（桃園：陳五常祠堂管理委員會，2018年），頁210；陳冬女士訪談，陳冬住所，2014年3月2日。

80 間方正之，《臺灣農業義勇團誌》（臺北：臺灣農會，1942年），頁60、78、119。

81 參看靖國神社，《祭神簿》，（新竹州之部）。

82 陳五常祠堂管理委員會重修，《陳氏族譜》，頁210。

83 陳冬女士訪談，陳冬住所，2014年3月2日。

84 陳冬長姐陳秋在濟化宮迎靈回臺之際，即曾與其他親屬至濟化宮參拜，陳冬當時並未同行。

85 陳冬女士訪談，濟化宮，2019年6月29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圖6、陳世鐘遺族至濟化宮參拜

說　　明：在濟化宮辦公室查詢《祭神簿》（左）；至十地寶塔3樓參拜靈位牌（右）
資料來源：陳柏棕拍攝（2019年6月29日）

從王其論、張金章及陳世鐘遺族尋親之例可知，對於這些遺族來說，或許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與在戰場上死去的親人建立連繫關係、公開悼念的場域，而濟化宮便是他們與死去的親人間連繫的場域。濟化宮似乎也在提供遺族追悼的「物件」（《祭神簿》、靈位牌）與「空間」（濟化宮本身及供奉英靈的十地寶塔）過程當中，取得前來參拜、尋親的遺族之感謝及肯定。

陸、結論

在1980年代初，因為濟化宮在有關至靖國神社迎靈的說法上出現瑕疵，以致招來輿論對於其在迎靈奉祀這項做法與行動上諸多的非議。但是在歷經1980年代末臺灣二戰遺族對日本政府進行求償、申請弔慰金之際，濟化宮因協助部分遺族取得戰歿親屬資料而備受好評；此後，濟化宮更成為一個「紀念場域」。

當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紛紛建立紀念碑及相關設施，追悼在戰爭中犧牲的軍民，在臺灣亦有3萬名以上的臺籍日本兵戰死或生死未卜，對社會影響甚鉅，然因與戰時臺灣人的立場相異，接替日本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所設置的忠烈祠，係祭祀建國前後以來，為「國家」殉難殉職的忠勇義烈官兵、人民，為中

華民國國族框架的宗祀或國殤致祭之神聖場域，[86] 曾加入日本軍隊而戰死的臺灣人，自然失去受國家表彰、祭祀的資格。

因此，為悼念、追憶在戰爭中戰死之臺籍日本兵而展開的慰靈、設立紀念碑等活動，長年以來均為民間自發性發起。隨著臺灣解嚴，由臺籍日本兵組織的戰友會活動在此時紛紛浮上檯面，自1990年代起，陸續在寶覺禪寺、潮音寺，甚至於海外，合力為戰死的袍澤設置慰靈碑，成為這些臺籍日本兵爾後集聚活動時重要的「紀念場域」；在濟化宮，除祭祀軍魂靈位牌的總牌位，尚有3萬餘名具名臺籍日本兵之靈位牌，安祀於靈塔之內，將靖國神社的祭神合祀制，轉化成臺灣人習慣的信仰方式，提供遺族一個可以公開進行憑弔的空間。此外，濟化宮收存之《祭神簿》無償開放遺族查閱，讓更多人在此尋得失落多年的戰歿親屬下落。無論最初迎靈的動機為何、程序是否合理，此舉確實滿足了部分遺族的需求，如今事過境遷，濟化宮逐漸成為遺族後代一個尋親探源之根據地，而重新受到肯定。

86 蔡錦堂，〈臺灣的忠烈祠與日本的護國神社・靖國神社之比較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第3期（2010年3月），頁4。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徵引書目

一、史料

靖國神社，《祭神簿》（新竹州之部）、（臺南州之部），新竹北埔濟化宮藏。
財團法人南天山濟化宮編，《民國108（2019）年農民曆》。新竹：財團法人南天山濟化宮，2019年。
陳五常祠堂管理委員會重修，《陳氏族譜》。桃園：陳五常祠堂管理委員會，2018年。

二、田野及口述訪談資料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海軍巴士海峽戰歿者慰靈碑」調查，屏東縣恆春鎮潮音寺，2011年11月26日。
張金章遺族訪談，電話訪談、濟化宮，2019年3月27日、3月31日。
陳冬女士訪談，陳冬住所、濟化宮，2014年3月2日、2019年6月29日。
陳秋女士電話訪談，2019年6月30日。
濟化宮董事長謝鏡清訪談，濟化宮，2018年11月25日。
濟化宮廟方人員訪談，濟化宮，2018年10月14日。

三、回憶錄、訪談錄

馬樹禮，《使日十二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年。
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四、報紙

《中央日報》，臺北，2003年。
《中國時報》，臺北，1991年、1996年、1998年、2005年。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日報》，臺北，1996年。
《聯合報》，臺北，1982-1983年。

五、專書

一ノ瀬俊也，《銃後の社会史—戦死者と遺族》。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編，《代發「臺籍原日本兵陣亡、重傷殘者弔慰金」申請須知》。臺北：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1988年。
日暮吉延著，黃耀進、熊紹惟譯，《東京審判》。臺北：八旗文化，2017年。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臺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
北埔鄉公所編，《北埔鄉概述》。新竹縣：北埔鄉公所，1998年。
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實，《遺族と戦後》。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江慶林主編，臺灣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小組撰稿，《臺灣地區現行喪葬禮俗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3年。
林東溪、張阿祿編，《關聖帝君會員》。臺北：信安診所吳子欽醫師私家版，1997年。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
范明煥總編纂，《北埔鄉志》，上、下冊。新竹縣：新竹縣北埔鄉公所，2005年。
浜井和史，《海外戦没者の戦後史：遺骨帰還と慰霊》。東京：吉川弘文館，2014年。
高橋哲哉著，黃東蘭譯，《靖國問題》。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年。
基佐江里編，《聞け！血涙の叫び：旧台湾出身日本兵秘録》。東京：おりじん書房，1986年。
陳柏棕，《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臺北：國史館，2013年。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日本海軍史》。新北市：月熊出版，2018年。
陳韜編，《濟化宮的回顧》。新竹：南天山濟化宮，1997年。
間方正之，《臺灣農業義勇團誌》。臺北：臺灣農會，1942年。
戦友会研究会，《戦友会研究ノート》。東京：青弓社，2012年。
臺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編，《臺湾・補償・痛恨：臺湾人元日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兵戦死傷補償問題資料集合冊》。東京：臺湾人元日本兵士の補償問題を考える会，1993年。
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編，《和平英魂觀音亭：靈安故鄉紀念碑落成慶典暨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念特刊》。臺中：臺灣中日海交聯誼會，1990年。

六、論文

林志剛，〈人權的演繹（上）：原臺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律師通訊》，第172卷第1期（1994年1月）。
黃智慧，〈「戰後」臺灣各族群對戰歿者的追悼方式與課題：兼論其與日本關係〉，收入黃自進主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年。
蔡慧玉，〈臺灣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初探：「潘朵拉之箱」〉，《臺灣史研究》，第3卷第1期（1996年6月）。
蔡錦堂，〈臺灣的忠烈祠與日本的護國神社．靖國神社之比較研究〉，《師大臺灣史學報》，第3期（2010年3月）。
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第10期（2015年10月）。
藍適齊，〈「喪失」在戰爭（記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民家庭〉，「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5年8月15-16日。
藍適齊，〈從比較的脈絡對臺灣人二戰史的反思：跨國性的臺灣人二戰主體〉，「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17年11月10-11日。
Smith, Kerry. “The Shôwa Hall: Memorializing Japan’s War at Home,” *The Public Historian*, 24:4 (Fall 2002).

七、網路資料

〈北埔濟化宮臺籍日本兵英靈春祭〉，收錄於「臺灣導報」：http://www.taiwan-reports.com/?c=articles&a=show&id=55078（2019/6/21點閱）。

「王塗發立委前往北埔濟化宮尋獲父親靈位」，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164576681&sk=photos&collection_token=1164576681%3A2305272732%3A69&set=a.4975966794678&type=3（2018/12/30點閱）
「神靖丸．紀念不幸陣亡的臺灣醫師．醫療助手．農業生產人員．1945年1月12日」，網址：https://shinseimaru.blogspot.com/2009/05/blog-post.html（2019/6/27點閱）。
「新竹北埔南天山濟化宮與二戰臺籍日軍靈璽」，網址：http://oursogo.com/thread-2063256-1-1.html（2018/12/24點閱）。
「靖國會」，網址：http://yasukunikai.com/（2018/12/24點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